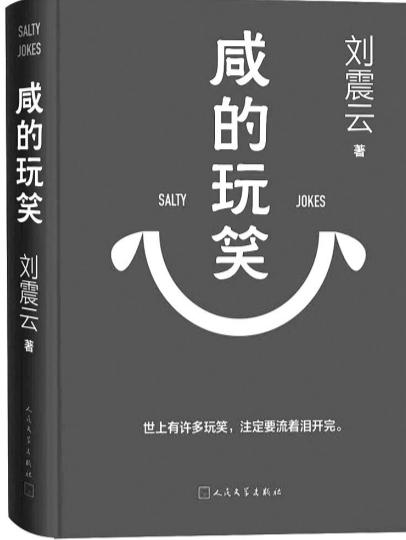


# 咸中回甘:市井生活的暖色幽默

刘梦泽

**刘震云在新作《咸的玩笑》中,完成了一次从冷静凝视到温情拥有的叙事转向。小说透过杜太白们的生活经历,揭示的并非仅是生命的咸涩,而是以含泪的暖幽默,细腻地呈现了市井凡人如何以其独特的异彩与不折的韧性,在荒诞中燃起希望。它是一曲献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暖色颂歌,让人于泪光中看见尊严,于玩笑里体察深情。**



时隔数年,刘震云携《咸的玩笑》重返文坛,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故事,更是一束与以往冷峻底色形成微妙反差的叙事暖光。书名中的“咸”,固然直指眼泪与汗水的滋味,是生存重压下的本能味觉;然而,纵观全书,作者的笔力显然超越了单纯体认苦难的层面。这一次,他更像

一位耐心的观察者,守着生活的蒸发皿,等待并指引我们去看那咸涩水分消失后,附着在皿壁上的、晶晶亮的结晶物——那是人在被动承受与主动应对之间,淬炼出的幽默、智慧、韧性乃至尊严。如果说刘震云早年的作品善于精准地测量生活施加于人的压力,那么《咸的玩笑》则致力于探究这股压力之下,平凡灵魂所能产生的、令人惊异的反作用力与精神折射。

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以标志性的“泪中带笑”的笔法,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图景。然而,这部作品的真正力道,不在于渲染命运的咸涩,而在于凝视泪水干涸后,生命自身析出的那层“盐”——一种粗粝而坚实的结晶。小说中,无论是主业红白喜事、副业“哲学探讨”的杜太白,还是他身边一群各有执念的市井友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异彩”,对抗着生活的同质化与荒诞感。刘震云以此完成了一次温暖的叙事转向:他从一个冷静的社会剖析者,转身成为平凡灵魂的倾听者与共情者,最终在生活的死结处,为我们系上了一个充满理解与释然的“活扣”。

《咸的玩笑》的核心情节,围绕着主人公杜太白一串串急转直下的命运“玩笑”展开。从教师到红白喜事主持,再到街头商贩,他的身份一路变化。小说的旨归并不在于渲染这种滑落过程的悲情,而在于凝视杜太白在每一次跌落谷底后,如何下意识地调整姿态,甚至在被磨平的棱角处,生出新的、适应性的光华。

“泪是咸的”,这一小说结尾处的点睛之笔,是全书的诗眼,也是其精神转折的枢纽。这里的“咸”,不再是单向度的苦难象征,而是一个充满辩证张力的起点。它既是外力施加的创痛证明,也是生命内部依然活跃、依然能够“感而知味”的生机证明。刘震云通过这一意象,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哲学递进:生活的目的,或许不在于避开所有“咸”的滋味,而在于如何将这种不可避免的滋味,经由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思考,转化结晶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如海水不能饮用,但其蒸发后留下的

盐,却是不可或缺的调味与防腐之珍。杜太白及其周围的市井朋友,正是在品尝各自生活的咸涩后,或于沉默中积攒韧性,或于絮叨中守护热情,各自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生命结晶。作者系的“活扣”,正是这种转化智慧的隐喻——它不是解开命运所有死结的万能钥匙,而是一种内在的弹性与和解的姿态,允许我们在承受重负的同时,依然保有呼吸与前进的空间。

在刘震云的小人物画廊中,《咸的玩笑》里的群像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暖系”光泽。他们不再是《一地鸡毛》中那般精神渐次熄火的形象,也不再仅仅是《一句顶一万句》里孤独的寻觅者。他们是一群在物质困顿中,依然顽强经营着精神世界,并散发出“异彩”的个体。

杜太白是这种转变的典范。他的每一次职业转换,表面看似妥协与落魄,内里却包含着一种底层生存哲学下的主动调适。主持红白喜事,他接触的是人生最极致的悲欢,这反而让他对命运有了更豁达的旁观;流落街头,他与更多元的市井生命为伍,精神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丰富。他的“思想头颅”从未低下,只是思考的内容从书本教义转向了更鲜活、更沉重的生命本身。他的韧性,是一种“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具体实践。而围绕他的配角们,更是一簇簇温暖的微光。爱打探隐私却自诩“忧国忧民”的老辛,将庸常的猎奇心理包装成一种滑稽的使命感,这是他在卑微中为自己建立的精神体面。自称“第欧根尼”的冥想馆主申时行,其行为虽显荒诞,却何尝不是一种在商品社会中,对古典精神生活的笨拙模仿与坚守?还有那位执着于制作完美兵马俑的裁缝老殷,他的专注已超越功利,抵达了“匠人”与“梦者”合一的境界。刘震云以极大的温情,倾听并放大了这些“异彩”。这些散落在生活角落,时常被误认为“古怪”或“无用”的执着与热爱,恰恰是抵抗生命同质化与虚无感的珍贵火

种。正是这些微光的彼此映照,构成了市井生活中一条隐秘而温暖的星河。

与主旨和人物的暖色转向相呼应,《咸的玩笑》在文风上呈现出显著的“淬炼”与“升温和“特征。刘震云标志性的幽默依然在,但其内核已从早期冷冽的讽刺与无奈的反讽,进化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疗愈性的“暖幽默”。

这种“暖幽默”并非是消解了苦难的严肃性,而是改变了我们面对苦难的情感姿态。它如同一双带着体温的手,轻轻抚摸生活的瘀青和伤疤,让疼痛在一种笑的共鸣中得到释放与舒缓。书中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比如杜太白主持婚丧的套路化解街头冲突,老辛将八卦上升为哲学——这些所引发的笑,不再是旁观者的优越之笑,而是带着深切理解的会心之笑。这种文风转变的背后,是作者叙事立场从“剖析者”到“共情者”的深刻移动。刘震云不再仅仅满足于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解剖社会机体的病症,他更像一个深入矿底的探勘者,执着于在黑暗的岩层中,搜寻那些自带光芒的精神矿石。他的悲悯,因此而具有了“建设性”。他不止于呈现伤疤,更致力于挖掘伤疤之下生命自我愈合的力量。全书氤氲的那种“泪中带笑、笑中含泪”的氛围,最终达成了一种美学上的调和与情感上的升华,让读者在合上书页时,心中充盈的不是绝望的寒意,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后的释然与暖意。

《咸的玩笑》超越了文学意义上的“好看”,刘震云以他日益醇熟的“暖幽默”与深沉的悲悯,完成了一次对普通人的文学拥抱。他试图告诉读者,生活或许是咸的,但认真活过、爱过、坚持过的生活,终能回甘。这部小说是刘震云创作步入化境的一份温暖证言。它标志着作者对小人物世界的探索,从外部环境的批判性写实,深化为内部精神宇宙的共情性照耀。小说中那无处不在的“咸”味,最终没有导向虚无的苦涩,而是在作者炉火纯青的叙事技艺下,蒸腾、结晶为一种关于韧性、尊严与爱的生命之盐。

## 读到——

### 漫长的相遇

李海卉

近日,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两本回忆录,两本书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叙事。《杂记赵家(纪念版)》(以下简称《杂记赵家》)以杨步伟鲜为人知的笔触,记录了她与语言学家赵元任60年的婚姻生活。《文采风流:复旦中文系名师轶事》(以下简称《文采风流》)则通过陈允吉的记述,展现了郭绍虞、朱东润等一代名师的精神世界。它们一横一纵,共同复原了“精神传承”的生动图景。结合相关作品——张新颖的《启明》,我们看到了家常笔墨中的大师风范。

《杂记赵家》将镜头对准家庭生活这个私人领域,杨步伟的文字如同一部家庭影像集,她与赵元任在清华园中的日子、与胡适等友人的往来,都成为时代画卷中的温暖笔触。书中那些珍贵的家庭照片由赵元任拍摄,与文字相得益彰。《文采风流》则将视野投向了学术传承更为正式的空间——书斋与课堂。陈允吉笔下的复旦名师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将学问与人格力量传递给后学。这两种空间互为补充,家庭生活的松弛与幽默,恰好平衡了书斋的严肃与专注。

在杨步伟的笔下,那些在学术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另一面”:陈寅恪和俞大维被描述成“如石狮子般专心治学”;哲学家金岳霖曾因自家母鸡“难产”而急电求助,请医学专业出身的她帮忙“接生”;刘半农为获得博士学位,硬着头皮忍受了6小时的“魔鬼考试”。

在《文采风流》及张新颖的作品《启明》中,我们看到了复旦名师们的多样面貌。贾培芳先生历经坎坷却“八十高龄仍生气贯注”。章培恒先生写作《洪昇年谱》时,竟是在零碎的边角纸和香烟盒纸上完成的。这种在艰难环境下的学术坚持,令人动容。《文采风流》特别强调了学术传承中的人格影响。陈允吉不仅记录了名师们的学术成就,还通过亲身经历,呈现了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承与精神风貌。

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这几本书采用了微观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杨步伟记录下的赵家60年,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风骨的生动注脚。这种将个体经验与历史脉络交织的写法,使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知。共同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既能幽默面对生活,又能严肃对待学问。

如果说《文采风流》是第三人称的“群星列传”,那么《启明》就是第一人称的“精神成长日记”。它让我们看到,传承不是静态的“接收”,而是一场在时间中完成的双向的“照亮”。

张新颖教授用“漫长的相遇”来形容他与老师们的关係,从青年到中年,他在老师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这种跨越时间的理解与感悟,正是精神传承的最佳注解。这种有温度的师承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具体而微的小事中,以及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全面浸泡与体认之中。

真正的师道传承,或许正是如此——它并非火炬般耀眼夺目的交接,而是如星火传递,在具体的师生之间,在漫长的时间里,用整个生命的温度去点燃另一个生命,使其也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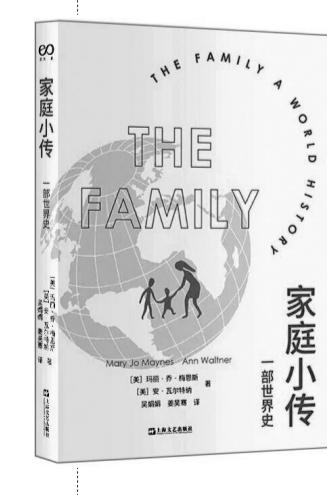
## 荐书

### 文学的河床



“文学爆炸”那些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运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作者哈维·阿延为了撰写此书,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研。本书里不仅包括作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那群改变世界的朋友的访谈,还包括许多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材料,以及储存在一段群体记忆中的件件鲜活逸事。



《家庭小传:一部世界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历史学家玛丽·梅恩斯与知名汉学家安·瓦尔特纳讲述了作为社会建构的家庭,在世界各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与时代背景下,塑造历史和被历史塑造的过程。家庭的历史与神话传说、生产方式等文明要素紧紧缠绕在一起。本书摒弃“帝王将相”的刻板历史叙事,揭示了普通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圣人的诸相:〈论语义疏〉中的孔子》  
中华书局

《论语义疏》是南朝梁经师皇侃对《论语》的注疏之作,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圣人的诸相》一书以《论语义疏》研究为基础,还原孔子形象的重塑过程,揭示孔子形象之演变及其历史成因,并依托皇侃的经学背景深入解读其《论语》诠释与圣人观念,以呈现一种具有经学视野的《论语》学。

# 《掌故》十年:微观历史中的人文图景

王 鹏

中华书局《掌故》系列第十二集在2025年10月如约而至,此时距2016年6月该系列创刊,恰好走过整整十年的历程。

《掌故(第十二集)》由严晓星主编,这本文集约12万字,延续了《掌故》系列的一贯旨趣,聚焦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文坛、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17篇文章与约60幅图片,共同构建了一幅中国近现代人文历史的微观图景。

这一集中收录的17篇文章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照亮了历史的隐秘角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苡口述、余斌撰文的《戴乃迭与杨焯之死》。翻开泛黄的书页,戴乃迭与杨焯之死中那份深埋半个世纪的痛苦,通过百岁老人杨苡平静的叙述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作为百岁老人杨苡生前口述的《口述自传》未刊稿,文章展现了杨益宪、戴乃迭故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杨益宪与戴乃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他们的故事早已为读者所熟悉,但这篇文章却聚焦于一个家庭的悲剧。文章探讨了这一事件的隐秘原因,在家人中也是讳莫如深的往事,通过杨苡先生平静质朴的讲述,格外令人动容。

谭苦苓的《“湖畔诗人”汪静之的“两行编辑泪”》则是本集中的一篇重头文章。通过回忆录、书信、档案等资料,还原了诗人汪静之上世纪50年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时期的一段经历以及相关史实。

其他文章同样各有侧重:白谦慎《我为古画打印章》从艺术家视角展示了书画鉴藏的细节;沈津《顾廷龙与中国丛书综录》则讲述了中国丛书编撰

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宋希於《有关王重民先生的几件边角史料》则挖掘了学界重要人物的生平细节。

《掌故》系列最大的特色在于学术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平衡在第十二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文章中既有严谨的史料考证,又有生动的人物描写。这种写作风格使得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益。例如,在讲述顾廷龙与中国丛书综录的文章中,既有对历史事件的精确考证,又有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使枯燥的学术话题变得生动可读。

《掌故》系列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有机结合。第十二集中文章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杨苡的口述文章,就是通过个人记忆来补充官方记录不足的。而谭苦苓关于汪静之的文章,则大量使

用了书信和档案等一手资料。

这种多元史料的运用,使得历史叙述更加立体和真实。

它避免了单一史料可能带来的偏颇,通过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印证,构建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历史图景。

《掌故》系列关注的是历史研究叙

事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和人物。

这些

“掌故”虽小,却往往是理解一个时代、

一个时期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像历

史拼图中的碎片,单独看可能微不足

道,但拼合在一起却能呈现出一个更

加完整和生动的历史画面。从学术角

度看,《掌故》系列可以被视为中国微

观史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平台。《掌故》

中的文章大多聚焦于具体的人物、事

件或物品,通过对这些“小历史”的研

究,反映出更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

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下历史学界越

来越受到重视。

# 简·奥斯丁克制叙事中的隐秘秩序

孟 虹

秘密》中揭开了这位英国女作家克制文字下的权力密码。这本书试图展示文学研究最激动人心之处或许就在于:重新发现那些我们认为已经彻底了解的事物。让我们看到,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能持续挑战我们的理解,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意义。

长久以来,英国文学巨匠简·奥斯丁以其对乡村社会、婚恋家庭细腻而精准的描述,被视为英国社会风俗的忠实记录者。“一小块象牙,我用很细的画笔在上面作画。”简·奥斯丁曾这样谦逊地描述自己的创作。她笔下那些机智的对话、微妙的情感与道德困境,构成了我们理解19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经典窗口。

D·A·米勒的《简·奥斯丁风格的秘密》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奥斯丁那表面优雅克制、情感隐晦的叙事风格,不仅是一种美学选择,更是一套隐秘而精密的社会权力机制。这一论断颠覆了传统奥斯丁研究中的两种主流倾向:一是将她视为纯粹的社会风俗画家;二是将她简化为女性情感的表达者。

在米勒看来,奥斯丁借助高度控制的措辞与叙事结构,巧妙地操纵人物的命运轨迹。这种运作不是通过公开的说教,而是通过风格的“自然化”实现的。米勒的理论框架是多元而交叉的。他主要从三个理论视角切入对奥斯丁风格的解剖:形式主义分析帮助他细致拆解奥斯丁的句法结构、叙事节奏和修辞策略;符号学方法使他能够解读这些形式选择背后的文学符号与意义系统;而“酷儿理论”的视角,则让他关注到奥斯丁叙事中那些被边缘化、被“规范化”的身份与欲望。

这种理论棱镜的复合运用,使米勒得以看到奥斯丁文本中那些传统批评视野忽略的维度。他特别关注奥斯丁如何通过高度控制的叙事声音,制造出一种“无标记”“去身份化”的叙述者形象。

这种匿名的、看似普遍客观的叙述声音,在米勒看来,恰恰是一种防御机制。它使作者“简·奥斯丁”本人得以在文本中隐匿,避免直接暴露于当时社会对未婚女性写作者的审视与可能的耻辱感。

米勒对奥斯丁叙事声音的分析可能是全书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之一。他挑战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奥斯丁的叙述者是全知全能、客观中立的。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奥斯丁的叙述者是一种“幽灵般的无人称”。这个叙述者不具备年龄、婚姻状况、社会地位等具体的主体位置特性。这种“无人称”特性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精巧的策略。它使叙述声音获得了表面的普遍性与权威性,同时隐藏了一个事实:作者本人(一位未婚女性)无法完全符合当时社会认可的存在模式。在米勒的解读中,风格成为一种对抗耻辱的防御工事。奥斯丁通过创造这种去性别化、去身份化的叙事声音,为自己在文本中开辟了一个安全空间。在这里,她可以观察、评判、讽刺,而不必直接暴露自己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位置。这种分析为我们理解奥斯丁作品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她标志性的文学技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种介于叙述者与人物意识之间的模糊地带,在米勒看来,是权力运作的绝佳场所。

要真正理解米勒观点的独创性,我们必须将奥斯丁放回她的历史语境。奥斯丁所继承的文学传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和“聒噪”。18世纪英国小说充斥着丑闻与感官描写,从理查逊的《帕米拉》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社会动荡是常见的主题。与这些作品相比,奥斯丁的题材范围似乎显得狭窄与克制。然而,这种“狭窄”正是米勒分析的关键。奥斯丁的选择性沉默——对暴力、国内外大事的回避,与她实际写到的东西同样重要。在她的文字边缘,始终聚集着破产、私奔等丑闻,只是这些很少被直接呈现。米勒的分析暗示,奥斯丁的风格选择是对她所处文学环境的一种回应与抵抗。面对一个充斥着感官刺激与道德说教的文学市场,她发展出了一种通过克制、反讽与含蓄来表达批评的叙事方式。这种风格本身,就成为一种立场的表达。她拒绝当时流行的文学套路,转而创造一种新的、看似更为“文明”的叙事规范。

米勒的研究为奥斯丁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鲜的视角与活力。米勒的交叉理论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框架。他将形式分析与政治批评相结合,揭示了美学选择与社会权力之间的隐秘联系。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看到,奥斯丁的“艺术”从来不是纯形式的游戏,而是深深嵌入在她的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